

天亮了,太阳出来啦,早晨6点31分,秋明火车站到了。当地气温17摄氏度,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火车站房崭新、气派,而且还有很浓的中国元素,一块大石头立在站房前,上面刻着俄文,我只看懂最后一行:2012。我猜是这一年重新修整了秋明火车站,问列车员金师傅,果然如此。俄罗斯人喜欢雕塑,以青铜类为主的各种金属雕塑站满城市的大街小巷。在秋明为什么用一块石头作为车站装饰?最为可能的是负责秋明火车站装修装饰的工程队伍来自中国,工程结束之后,他们以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立下这样一块石头,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例证。

关于秋明我们知道得或许不多,但在俄罗斯,这里可是一个名气响当当的名城。成吉思汗远征欧洲时,曾在此驻军上万,因此这里也被叫做“万人城”,秋明即蒙古语“万人城”的意思。这里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储量居欧洲首位,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是西伯利亚最大的商业和交通中心,现在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基地。

当然,关于秋明,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列宁的遗体曾经在这里存放近4年的时间。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军队突然发起对苏联的进攻,举世震惊。战火虽然没有烧到这个距离莫斯科2139公里的石油重镇,却因为大量的军工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搬迁至此而成为新的国家中心。与此同时,为了躲避战火迁移到此的,还有原本保存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遗体。据说,列宁的遗体是1941年7月10日用一列专列运送到秋明的,存放在秋明农学院的一座别墅内。二战结束前的1945年4月,列宁遗体在秋明秘密存放近4年之后,被运送回莫斯科,重新安放在红场的列宁墓,供人们瞻仰。

这是一段让秋明人非常自豪的历史,现在的舆论

【北京—莫斯科火车之旅⑦】

从秋明到叶卡捷琳堡

□ 许志杰

中有一些关于列宁遗体保存不当的说法,他们予以坚决回击,认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使列宁遗体完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受战争影响,存放条件肯定与莫斯科的列宁墓没法比,但是,秋明人尽力了。

火车开出秋明站,下一个停车站是叶卡捷琳堡,两地相距325公里,列车需要运行4小时24分钟。

其实,俄罗斯的铁路已经提升改造,比起蒙古的单线内燃机车牵引,更为先进。一个是复线行驶,不用考虑让车、等车;再一个是使用电力机车,速度明显加快,停车的间隔距离也明显拉长。现在客运列车的一般时速都达到了150公里,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准高速

列车更是跑到200公里以上。但是,我们目前乘坐的这趟列车是1995年从当时的联邦德国进口的。蒙古国和俄罗斯都属于高寒地区,这列火车的外部零件是耐高寒的,不至于在极寒的冬天被冻得趴窝,但是,毕竟已经连续使用了近20年,透风撒气,假如行驶途中碰上风沙天气,满车里都是细沙,把人搞得灰头土脸,嘴、耳朵眼、眼睛里都是沙子。鉴于车况,我们的列车依然被限制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下。蒙古国的线路基础太差,一时半会儿无法提速,俄罗斯的铁路在全面升级改造之后,提速的空间很大。如果在俄罗斯境内能提到每小时150公里,整个运行时间将缩短12小时以上,旅行的舒适度也会提高不少。

前几年,曾经有国际列车要换新车厢的计划,已经在国内一家机车厂完成设计制造,并进行了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的试验,发现了很多设计与实际应用不相符合的问题,比如耐寒、抗风沙都不及正在服役的这列“老爷车”。此后,关于国际列车更换车厢的事就没了音信。

莫斯科时间11点15分,叶卡捷琳堡车站到了。这里是俄罗斯的铁路交通中心,有通往全国各地的7条铁路在此交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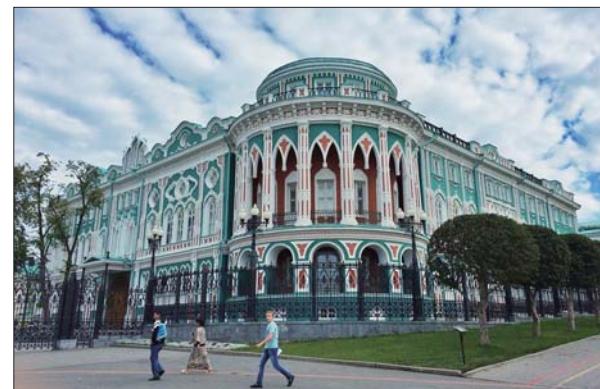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有很多故事的城市,城市的名字来自彼得大帝的妻子叶卡捷琳娜

一世。该市建于1723年,也是这一年全俄第一座钢铁冶炼厂在此落成。发生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大历史事件无疑是,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人在叶卡捷琳堡被沙皇尼古拉二世50岁,妻子46岁,儿子14岁,四个女儿分别是23岁、21岁、19岁、17岁。当地的《乌拉尔工人报》发表消息:“(1918年)7月16日-17日夜间,根据乌拉尔州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苏维埃的决议,枪决了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戴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多了。”当然,历史总有很多剧情反转,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本院主席团宣布,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镇压毫无理由,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传奇故事,到这里画上了一个轮回式的句号。

这里还是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的家乡,叶利钦去世之后,叶卡捷琳堡市为了纪念这座城市的骄傲,命名了叶利钦大街,建设了叶利钦总统中心以及叶利钦纪念碑。

当然,叶卡捷琳堡还有一景,那就是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乌拉尔山脉的“界碑”。列车从叶卡捷琳堡开出,十几分钟就到了……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域外走笔】

美国人的鞋

□ 肖复兴

跳着熟练的芭蕾,尖跟在地板上响着轻快的声音,像是脸上的微笑迸溅出的回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出现了女子身高自恋症。矮个子的女人穿高跟鞋,高个子的女子也穿高跟鞋。在美国,很少见到洋人出现这样的景观。即便女人个子矮小,也很少借鞋跟以增身高,来平衡恋爱中的心理期待与价值指数。

在美国,无论男女,大街上的人们更爱穿运动鞋。如果天稍稍一热,人们便早早换上凉鞋。凉鞋中,居多的是那种人字凉鞋,可以从开春一直穿到秋末。有时候,我会想,美国人的生活真是太简单了,一年四季,有一双凉鞋、一双运动鞋、一双上班的皮鞋,就足够了。如果讲究一点儿的,再有一双高筒皮靴;如果再时髦一点儿的,买一双雕花的牛仔靴,已经算是奢侈了。

去年夏天一个周末的中午,还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中心,在一家餐馆里吃午饭,坐在室外的凉伞下,面前就是直通纪念碑的大街,正好可以看看来来往往的人们脚上的鞋。趁着菜还没有上来,我想做一个小

试验,看看从我面前走过来的人,有多少穿运动鞋的,有多少穿凉鞋的,有多少穿皮鞋的,又有多少穿我们国内那种高跟鞋的。数到一百的时候,觉得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了。一百人中,除了六位穿皮鞋的,穿凉鞋的和穿运动鞋的几乎平分秋色——穿运动鞋的略多一些——而那种高跟鞋,一个也没有。

坐在那里,我有些走神。为什么运动鞋更多一些?因为走和跑是美国人日常生活和运动的主要方式。无论在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疾走或跑步的人,特别是在一早一晚和休息日,跑步的人更多。所以,在大街上见到的人穿运动鞋更多一些,是不足为奇的。

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我也有了自以为是的新发现:鞋,不光是关系着人们的生活水平、舒适程度、价值观念、审美需求,也关乎人们生活和生命存在的方式。美国一般人对鞋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美、为了增高、为了给人看,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与生存。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名家背影】

忆张忍让先生

□ 范海风

2015年是曲阜师范大学创建六十周年。在迎接校庆的那段日子里,我常忆起那些曾为曲师大的创建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同志,其中就有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并毕生为其效力的张忍让教授。

我与张忍让同志相识于1961年。那年秋天我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张忍让是中文系第一届本科四年级学生。我作为助教,担任该年级古典文学课的教学和辅导工作。记得有一次让全体同学默写王勃的《滕王阁序》。默写一开始,全体同学都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没人交头接耳,更没人翻看教材,态度极为严肃认真,秩序井然。规定时间一到,同学们都主动交卷,一份不缺。事后我对所有试卷逐一进行审阅,发现在近百份试卷中,张忍让的成绩最好,不仅默写出的课文内容准确完整,而且字迹端庄沉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2年暑假,张忍让毕业留校,被安排到写作教研室工作,我们成了同事。那时虽不在一个教研室任教,但由于教师每周都有集体学习和劳动,很快也就熟悉了起来。我从与他同时留校的几位同学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上学期间就酷爱写作,曾利用课余时间创作过长篇小说,并在《山东文学》等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许多作品,知道了他不仅古典文学学得扎实,而且文笔很好,才华横溢。

1970年至1974年,我校曾一度与山东大学文科在曲阜合办过几年山东大学。1974年分校时,山大中文系的同志曾动员张忍让到济南去工作,但他未去。当时,张忍让刚过三十岁,但他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已达到较高的层次和境界。他为人儒雅谦和,治学严谨,长于理性思维,提笔行文总有独到见解。在教学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讲课时节奏快慢适度,措词精确恰当,让学生有回味咀嚼的过程。讲课结束后,仍弦外有音,留有余地,总能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我在中文系工作时,张忍让常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一些青年教师面前说,我要好好干,争取将来被提拔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因为他平时爱开玩笑,所以我听了也只是付诸一笑,从未把他的当真。1984年我被调出中文系,过了几年,发现他真的从写作教研室转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说过的那些玩笑话其实是在委婉地表达他有意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愿望。

他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时虽已人到中年,但由于他早有涉足,所以一经出手,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就相继发表了《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演进的基本轨迹》等系列论文20多篇,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其代表性学术专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被山东省教委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为此他在1989年被评为教授,200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张忍让担任系主任后,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一次我在文科教学楼前碰见他出差归来,问其何至,他回答说是到聊城师院中文系去商量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我又问他怎么去的,他说是乘曲阜至聊城的班车。因那时中层干部外出公干多是向学校车队要车,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没要个车,他回答说班车很方便,就没要。听后我虽未再说什么,但心里感到,在当时的风气下,他能严于律己,十分难得。

记得在他尚未退休时,我与他同时参加过一次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言中的几句话我记得十分清晰。他说,我不是没有另谋高就的机会和条件,但我不愿意离开母校。母校培养了我,我要尽心竭力地回报母校,终生为母校的发展效力。散会时我与初学导师教授一路边走边议,认为他的发言传达出了一大批曲园人的共同心声,他们把根深深扎进曲园,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和全部智慧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在美国,走在街上或坐在街旁,我爱看米来往往的人脚上穿的鞋。因为和我在国内看到的不大一样。

在国内大街上,人们穿的鞋远远要比美国这里的花样繁多、色彩炫目。在国内,常常会看到年轻女孩子脚上的鞋——名牌自不待说,光是样式,就让人眼花缭乱——冬天的高筒皮靴,夏天的五彩凉鞋,春秋两季的船形或盖式或香槟或复古或盘花或镂空或平跟或高跟或尖跟或坡跟或松糕跟……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增高鞋跟的鞋子,从鞋底就开始增高整整一层,然后再跟上做足了文章,旱地拔葱一般,一夜恨不高千尺一般,让身高一下子拔高许多。看这样的女人在大街上风摆柳枝袅袅婷婷地走,总有些杞人之忧,觉得她们像是踩着高跷似的,一不留神,就会崴了脚。

在美国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这样的景观——但也见不到过几次这样的高跷鞋,大多是我们国内的女人。有一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中心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我见到一位中国女人,大约